

THE CHANGE
OF ENGLISH EDUCATION IN CHINA
AND ITS INFLUENCE ON
SOCIAL DEVELOPMENT

中国英语教育的变迁及对
社会发展的影响研究

周伟 著

非
外
借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中国英语教育的变迁及对 社会发展的影响研究

周伟 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一本英语教育研究专著,在系统梳理中国英语教育变迁的基础上,初步分析了中国英语教育变迁及其社会物质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等不确定因素的互动关系,归纳了在中国英语教育变迁的过程中,英语教材与教学方法的变化规律。同时本书还就英语对近代、现代、当代以及走向全球化今天的中国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本书适合英语专业师生教学使用,也可供从事英语教学和文化研究的广大工作者和所有关心英语教育教学的人士阅读参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英语教育的变迁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研究 / 周伟著.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682-3414-6

I. ①中… II. ①周… III. ①英语—语言教学—教育史—研究—中国
IV. ①H319-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89086号

出版发行/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邮 编/100081

电 话/(010) 68914775(总编室)

(010) 82562903(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010) 68948351(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19.5

字 数/361千字

版 次/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78.00元

责任编辑/武丽娟

文案编辑/武丽娟

责任校对/周瑞红

责任印制/边心超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本社负责调换

前言 Preface

在19世纪上半叶之前，英语曾经被中国人认为是“蛮语”，但在今天，英语教育却成为教育的重中之重，社会上也出现了学习英语的热潮。是什么原因导致英语教育在中国的地位发生了急剧变化？影响其变化的因素又有哪些？在变化过程中，中国学习英语的风气、指导思想、课程设置、教材、教学方法等方面有了怎样的沿袭和变化？这些都是值得人们探讨的问题。为此，本书试图对中国英语教育的变迁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进行初步的梳理和分析，以期总结出英语教育的规律，从而为我国当今的英语教育改革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我国是一个外语学习大国，但是国人拥有的外语能力，却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发展之需要，特别是在语种布局、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各领域精英人物的外语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不足。要解决这些问题，亟待在国家层面进行具有远见卓识的外语规划。

自改革开放以来，英语已经成为中国人了解国际社会，扩大改革开放力度，付出最多学费和沉重代价的一门学科，也是中国人为借鉴世界各国优秀文化遗产时使用频率最高的一门外语。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蓬勃发展，英语的价值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认识。社会上曾流传一句话：一个不懂计算机的人是现代文盲，一个不懂英语的人是国际文盲。人们甚至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英语就是金钱，英语就是机遇，英语就是走出国门、面向世界的法宝。

在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和人民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英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更加激发了北京、上海乃至全国人民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在中国已经持续了30多年的“英语热”，几乎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步步深入，英语已经与中国亿万人们的学习、工作、生活息息相关。因此，无论从中国人民的现实学习、工作、生活需要考虑，还是从中国未来的语言发展战略高度考虑，深入研究现代英语的形成与发展以及英语对世界与中国的影响，已经成为我国从事英语教育和研究的工作者必须认真面对的重要课题。

对此，英语教育工作者必须保持非常清醒的头脑，在英语教学过程中，一定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指导英语教学活动，提高学生的语言文化辨别能力和批判能力，使他们能够自觉地从英语语言文化中吸取营养，剔除糟粕，使英汉双语学习水平同步提高。

希望通过本书的抛砖引玉，唤起更多对中国外语发展战略研究和中外语言文化交流感兴趣的读者，全方位、多角度地关心和深入探讨英语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和21世纪英语在中国的发展趋势，让英语教育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更好地为弘扬中华五千年优秀文化服务，为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社会和谐进步服务。

著 者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中国早期的英语教育·····	001
第一节 早期中外贸易中的语言 ·····	002
第二节 作为传教工具的英语 ·····	010
第二章 清代后期的英语教育·····	023
第一节 洋务运动时期的英语教育 ·····	024
第二节 维新新政时期的英语教育 ·····	043
第三章 民国时期的英语教育·····	062
第一节 中学英语教育 ·····	063
第二节 高校英语教育 ·····	084
第三节 英语教育特点 ·····	106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英语教育·····	108
第一节 社会背景及其对英语教育的影响 ·····	108
第二节 中学英语教育 ·····	116
第三节 高校英语教育 ·····	123
第四节 意识形态与英语教育的关系 ·····	131

第五章 改革开放后的英语教育····· 133

第一节 改革开放与英语教育的复苏····· 133

第二节 中学英语教育····· 136

第三节 高校英语教育····· 141

第四节 改革开放与英语教育的关系····· 149

第六章 全球化背景下的英语教育····· 151

第一节 全球化与英语教育的新趋势····· 151

第二节 中学英语教育问题及改革····· 153

第三节 高校英语教育····· 156

第四节 非国民体系的英语教育····· 166

第五节 全球化背景下英语教育的革新与
多元化····· 169

第七章 中国英语教育变迁的反思····· 170

第一节 影响中国英语教育变迁的因素····· 170

第二节 中国英语教育变迁中的几个转变····· 177

第三节 中国英语教育应面对的几对关系····· 182

第八章 英语对近代中国进步的影响····· 185

第一节 中国近代英语翻译思想家的杰出
代表····· 185

第二节 英语对孙中山民主革命一生的	
重大影响	199
第三节 英语对近代中国外交的重大影响	210
第九章 英语对当代中国发展的影响.....	223
第一节 英语对中国革命的重要影响	223
第二节 英语对中国军队和外交的重要影响 ...	230
第三节 英语对中国新闻出版和广播电视	
事业的重要影响	236
第十章 英语对中国走向全球化的影响.....	245
第一节 新世纪英语在中国第二语言的领域	
迅速扩大	245
第二节 借助英语, 加快汉语走向世界的	
步伐	253
第三节 中国英语未来的发展趋势	266
第四节 探索中国英语规范化的有效途径	286
参考文献.....	302

第一章 中国早期的英语教育

中国作为目前世界上学习英语人数最多的国家，其英语教育的起源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国内外很多学者把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成立看作中国英语教育的开端。但实际上，在此之前，出于贸易和传教的需要，英语在中国民间的传播早已有之。根据这一线索，本章分别从早期英语在贸易和传教方面所起的作用入手，回顾英语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渊源。

首先，分析了早期中外贸易的语言——洋泾浜语，它是中西双方不愿学习对方语言而产生的不中不西的语言变体。它经16世纪中期澳门葡语发展为18世纪盛行的广东英语，至19世纪中下叶流行为上海洋泾浜英语，前后历时三个多世纪。尽管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变化，时至今日洋泾浜语几乎已经消亡。但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它在中外贸易往来和中西文化交流中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上海洋泾浜英语盛行时期，社会上还出现了上海洋泾浜英语培训班，可以说它是我国民间英语培训的雏形。

其次，对我国英语教育产生重要影响的实体为早期教会学校。19世纪初期，西方国家为了推行基督教文化，陆续来华传教。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受伦敦差会的派遣来华传教。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的对外闭关政策以及民众对基督教教义的不了解，传教活动难以顺利地进行。因此，外国传教士希望通过创办教会学校的形式打开传教的道路，1818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马六甲建立了英华书院，这所学校于1843年迁到中国香港，也是教会学校英语教育的开端。此后，小规模教会学校逐渐在中国的港口城市得到了发展。与洋泾浜语不同，教会学校教授的是标准英语，但是其涉及的内容比较狭隘，主要是日常用语以及基督教的教义，可以说早期教会学校的英语教育是传教的工具之一。但是，它确实将正规英语教育的概念引入我国，并奏响了中国学校英语教育的先声，在客观上促进了英语在中国的传播。

第一节 早期中外贸易中的语言

在早期的中西贸易中曾普遍存在一种不中不西的语言,称为“洋泾浜语”(Pidgin)。从词源上,“Pidgin”这个词源于中国人(主要是粤语区的人)对于英语单词business(生意)不准确的发音。它指的是讲不同语言(通常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族群由于交际的需要,临时创造出来的一种混合语。中国洋泾浜语是由作为强势群体的语言(葡萄牙语、英语)和从属群体的语言(汉语)相互融合而成的,其中葡萄牙语和英语处于主导地位,先后作为中国洋泾浜语的上层语言。

根据语言学家霍尔(Hall)的看法,中国洋泾浜语的发展可以分成四个阶段:起源、经典、扩展和消亡。他进一步指出中国洋泾浜语主要是外国人和中国人交流的工具以及商业往来的媒介,只有到了扩展时期,才开始用于外国人和中国上流社会的交往。第一个阶段为18世纪之前,以澳门葡语为主导。第二阶段为18世纪到19世纪40年代,中英贸易迅速发展,形成了盛行一时的广东英语。第三阶段为19世纪40年代到19世纪末期。鸦片战争之后,广州、厦门、上海、福州等地开始对外通商,作为通商口岸之一的广州,其原本就存在的中国人与外国人交流的媒介“广东英语”借此机会得以北上,并逐渐影响其他几个城市。其中较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开埠后的上海,开始盛行所谓上海洋泾浜英语。第四阶段为19世纪末期到现在。19世纪末期,洋泾浜英语逐渐消亡,其主要原因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以及不规范的用语所带来的交流上的不方便,使人们在对外交流中更喜欢用标准英语。今天,洋泾浜英语作为一种曾经存在过的实际交流的语言大部分已经消亡,但也有部分词汇被现代汉语和现代英语所吸纳。尤其在一些曾经的英国殖民地、租借地区,比如香港,人们还能从一些当地的特有词汇中看到它的影子。

尽管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洋泾浜英语实际是一种民间自发产生的实际交流用语,在很长的时间内并不受到主流社会的重视和尊重,过去也鲜有学者,尤其是国内学者对其进行研究。但是它作为一种确实存在过的交流语言,曾经在当时中外贸易往来和中西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并对后世的英语和英语教育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因此,近年来对洋泾浜语的研究也慢慢被更多的学者所关注,并逐渐形成了一个研究热点。

一、澳门葡语

中国最早的洋泾浜语可以追溯到澳门葡语,它是16世纪葡萄牙殖民者占据我国澳门之后作为一种贸易语言而产生的,其首要的功能是为了双边贸易,其次是为了传教。

葡萄牙人刚到澳门时发现无法与当地人沟通,语言不通成了交流的最大障碍;而当地人出于生计的需要也希望能跟葡萄牙人及其他外国人进行交流。在此背景下,产生了一种以沟通交往为目的的澳门葡语或称为广东葡语、洋泾浜葡语(Pidgin Portuguese)。这种语言主要由中外商人、水手、中国通事与买办使用,后来也成为外国传教士和当地店主、苦力的重要交流工具,是葡萄牙语与中国话的混合体,但“它的用法与发音和真正的葡萄牙语相比讹误很大,刚从里斯本来的人几乎听不懂”。

明清时期,中国朝野盛行的“中国独居天下之中,东西南北皆夷狄”的观念根深蒂固,士人耻于过问这种“下人”和“夷人”的“鸟语”,因此,对澳门葡语进行研究的国人寥寥无几。印光任、张汝霖编撰的《澳门纪略·澳译》部分收录了395条澳门葡语词条,分5类,即天文类83条、人物类161条、衣食类52条、器物类48条、通用类51类等。这些词条以汉字记录,主要以粤方言拼写,也有以闽方言拼写的。《澳译》中记有“皇帝”,汉字注音为“燕罢喇多卢”,葡文对应为“Imperador”;“澳门”,汉字注音为“马交”,葡文对应为“Macau”;“五月”,汉字注音为“马约”,葡文对应为“Maio”;“十二月”,汉字注音为“亚我斯笃”,葡文对应为“Agosto”;“小西洋”,汉字注音为“我呀”,葡文对应为“Goa”;“兵头”(即“总督”),汉字注音为“个患那多虑”,葡文对应为“Governador”;“和尚”(即“神父”),汉字注音为“巴的梨”,葡文对应为“Padre”;“恭喜”,汉字注音为“没度扫煨打地”,葡文对应为“Muito Saudade”,等等。另外,在《海录》一书的“大西洋”条里,“国王”,汉字注音为“哩”,葡文对应为“Rei”;“一等文官”(即“首相”),汉字注音为“善施哩”,葡文对应为“Chancellor”;“海岸”,汉字注音为“哥什塔”,葡文对应为“Costa”;“法官”,汉字注音为“油衣使”,葡文对应为“Juiz”等。

澳门葡语是中国洋泾浜英语的雏形,与后来的广东洋泾浜英语有着密切的联系。美国人亨特的著作提供了一些语源学方面的证据。如广东英语中的mandarin(官员)源于葡语mandar(命令)一词;compradore(买办)源于葡语compra(买)一词;joss(菩萨)源于葡语Deos(宙斯);英语great(伟大的、宏大的),在广州英语中注音为“架栏地”,是葡语grande(宏大的)的读音演化而来的;英语soup(汤),在洋泾浜英语中读音为“苏拔(Soo-pe)”;英语merchant(商人),在洋泾浜英语中读音为“麻占(Ma-chen)”;英语country-ship(国家船,即中西贸易船),在洋泾浜英语中读音为“港脚船”。马廉颇也称:“考虑到当时葡萄牙语是中西贸易中的通用语言,加之早期英国或其主要部分英格兰的发音,都与上述称呼可以对音,故早期对英国的

称呼,很可能译自葡语……”在我国古籍中,成书于1745—1751年的《澳门记略》使用“英吉利”三字译英国,而实际上,从1707年起,英国的正式国名已是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王国(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在《联盟法案》下统一,国名正式定为“大不列颠王国”),故《澳门记略》中的“英吉利”一名显然来自葡语。

19世纪之后,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美国,逐渐取代葡萄牙这一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与中国贸易的主要国家,广州、上海成为贸易往来的主要港口,作为一种优势媒介语的英语演化出的中英混合语应运而生,中葡混合语“澳门葡语”因此而失去其主要地位。“澳门葡语”是早期中国对外贸易的产物,也是第一批西方殖民主义者渗透中国的副产品。

二、广东英语

早在15世纪末,英国就开始探寻通往中国的道路,希望能与中国建立通商关系。到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年)时代,英国的资本主义有了较大的发展,殖民扩张思想广泛传播,印发了许多关于航海、旅行与地理发现的文章,其中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找到通往中国的新航线。从1576年开始,英国的商队便不断探索通往东方的航路。1588年,英国海军在英吉利海峡一举击溃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成为后起的欧洲海上强国。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旨在向东方进行有计划、有规模的经济掠夺。英国在南洋群岛、日本等地开展贸易,并与中国建立起频繁的间接贸易关系。1637年,约翰·威尔逊(John Weddel)船长率领四艘英国船队首次到达中国广州,企图与中国建立直接的通商关系,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揭开了明清时期中英关系的序幕。1685年,清政府开放海禁,在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个对外贸易港口设立海关,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等事务。当时英国对华贸易在各国中占首要地位。1699年(清康熙三十八年),英国船只“马克来斯菲尔德”号第二次进入广州港,英国输华的商品主要是毛纺织品、印度棉花和檀香等;中国输英的主要商品有茶叶、丝绸、瓷器、漆器等。同年,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获得到广州开设商馆的权利,之后英国到中国的船只日益增多。1715年,东印度公司决心要把对中国的贸易建立在一个正常基础之上,于是它在广州设置了一个有固定员司的商馆,并且定期派遣船只。东印度公司在广州,通常由12个管理商务的代理人组成一个单一的团体,一般由三四个职位较高的成员组成一个特派委员会,直接受伦敦东印度公司董事会领导,这个特派委员会的首领,中国人称为大班。《东印度公司编年史》中记载:“1715年,在中国沿海出现了一种很奇特的语言……”直到18世纪中叶以后,英国在中西贸易中的地位上升,已占全部中西贸易额的80%以上。英语地位压倒葡语,于是产生以广东土

音注读英语的所谓“广东英语”(西洋人称为Canton English),随着时间的推移,“广东英语”代替“澳门葡语”。按广东英语也称“Pidgin-English”“pidgin”一词为“business”(生意)一词的讹传,两者合起来意为商业英语。这种“广东英语”为汉语和外语混杂产物,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关于“广东英语”的最早记录出现在18世纪40年代的一本英国人的航海记中。其中有两个例句:“I moiki handsome face for he; I moiki grandi chin-chin for he”(均表示“我向他致意”)。

广东英语是一种民间汉语与英语接触的产物,并成为中英商人的通用语,主要用于外国人商人和中国雇员、中国店主与外国商人、外国航海者与中国船员等之间的交流。美国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描写了19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初到广州时,许多来访问他的中国人大致都能讲英语的情形。确切地说,这些中国人讲的是广东英语,有时他并不能完全听懂。1836—1837年,一位经澳门来广州的西洋人出版了《番鬼在中国》,详细地记载了他与中国人接触时听到各种人讲“广东英语”。1836年,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在《中国丛报》刊文,介绍在广东佛山刊印的两本有关洋泾浜英语的教科书:《红毛通用番话》与《澳门番话杂志丛抄》。从《红毛通用番话》中可以知道:这种语言主要作为一种口头交际语流行于广东地区,靠声音而不是文字,靠听讲而不是阅读进行交流,所以拼写形式也不固定。这本小册子收集广东英语词汇约380条,分为生意数目门、人物俗语门、言语通用门、食物杂用门等四项,主要以贸易和日用词汇为主。

广东英语在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有一定的特征:广东英语的发音与真正英语的发音区别较大,它的主要特点是将汉语或广州方言的某些因素带入英语。亲自考察过广东英语的卫三畏指出:“由于汉语发音具有单音节特征,而英语单词中却包含许多元音,成年人几乎无法准确地说出有3~4个音节的词,特别是几个辅音连在一起的时候。结果是人们说这种词的时候,发音变得支离破碎,对不熟悉这种情况的外国人来说,几乎无法听懂”。汉语不存在复辅音(上古汉语除外),所以有复辅音存在或以辅音结尾(包括-e结尾的开音节)的英语词往往需加上一个元音,以形成中国人易于发音的音节。如catch读作catchee, make读作makee, much读作muchy。当时广州人用广东方言注英语读音,经常用相近的其他音素来代替标准英语中的发音。如“man”(男人)注音“曼”“soup”(汤)注音“苏披”“today”(今日)注音“土地”。词汇方面,广东英语的一些词汇源于澳门英语,如上文提到的英语单词great(伟大的、宏大的),在广东英语中注音为“架栏地”,是由葡语grande(宏大的)的读音演化而来的。

还有一些词汇是中国民间“语言学家”创造出来的。广东英语的词汇量很小,使

人易于记忆和使用。所以常常有多种意义的单词如chop, 它“字面上的意思是某种文件”, 但同时它有着十分广泛的用途。chop可以表示一个店主的账单; 上谕和官员的告示; 期票、收据、印花或印信、起落货物、商标或者特许状等的称呼。亨特认为广东英语是一种“没有句法, 也没有逻辑联系的语言”。没有标准英语中的人称、数、时态、语态等变化, 所有的单词基本上只有一种形态, 各种句子成分基本上按汉语或广州方言的词序来排列。如You wantchee eat? (你要吃吗?), My no can find the house key (我找不到房间的钥匙), You see no see the play? (你看不看这出戏?) 简而言之, 广东英语是一种按汉语特征和习惯来表达的口语。

由上面的例子可见, 广东英语作为鸦片战争之前中外双方在商业往来上进行沟通的主要工具, 其宗旨是为方便口头交流, 实用性目的强, 其特点是: 采用中英对照及汉字注音的形式, 语序以汉语语法为基础, 语句以单词组合为特点, 发音以粤语方言为主。广东英语虽然不太规范, 使用的范围有限, 然而它使近代中国人认识、学习和掌握英语, 在减少早期中外交流(尤其是中英、中美之间的交流)的语言文化障碍以及促进五口通商的发展和繁荣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广州是当时主要的国际贸易中心之一, 然而当地方言或中国官话都没有为贸易各方所使用, 反而由当地人创造出一种不中不西的语言, 成为中西贸易与交往的媒介。造成这一怪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就中国而言, 闭关时期清政府严禁国人学习英语; 士大夫阶层鄙视“番鬼”“番语”和西方文化且不屑于学习英语; 西方殖民者经常骚扰中国沿海港口, 造成中国民众敌视西方人, 不愿学习西方的语言。就西方国家而言, 中国政府禁止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自然的语言交流, 若有中国人教外国人汉语, 以叛国罪论处, 这使西方人无法合法地掌握汉语, 以作为正常的交际语言; 当时中国缺少初级汉语语法书籍及词汇手册等学习汉语的材料, 也增加了西方人学习汉语的难度。中文的方块字不便记忆, 语言学习耗时过多。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方人以西方文明优越感与殖民者姿态傲视中国。他们认为西方人在思维、语言上较中国人优越, 学习中文不能给他们带来直接的利益。因此, 他们中愿意学习汉语的人很少, 精通汉语的外国人几乎没有。美国人亨特在其《广州“番鬼”录》中描述: “在我1825年到达中国后的几年中, 只有3个外国人是中国人通, 一个是马礼逊博士; 一个是现在的达庇时(John F.Davis)先生(即刚卸任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本部总督); 最后一个就是我这个美国人。”

三、上海洋泾浜英语

鸦片战争后, 上海逐渐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首要港口。1845年, 英国领

事与上海道台签订了《上海土地章程》，开辟了英租界。不久，美国、法国纷纷在上海设立租界。在洋行、旅店、外国使馆就职的中国人以及经常为外国人提供服务的黄包车夫及佣人对广东英语并不熟悉，在日常交往中，开始采用上海及东南沿海地区的方言与英语的混合语进行贸易及日常生活的交流。

由于上海开埠本身就是鸦片战争失败后屈辱条约的产物，因此在双方的实际交流中外国人显然占据了强势的地位，上海人对外国人的态度较广东和内地人不同，大多数的广东人和内地人称西方人为“夷人”和“洋鬼子”，称西方人的居住之地为“夷场”；而上海人则称西方人为“外国人”和“洋人”，称上海租界为“沪北”和“十里洋场”。开埠以后，上海人从一开始就敢于冲破语言障碍，直接与洋人频繁地接触、交往，进行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活动。

随着上海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上海洋泾浜语发展迅速，也促进了早期中国英语教育的发展。19世纪60年代之后，社会风气开始转变，愿意学习英语的上海人越来越多，教会学校一般不开设英语课程，官立学校的英语教育刚刚开始，正规的学校英语教育满足不了社会对英语的要求，一些英国人和懂英语的中国人出于商业目的，创办了面向社会招生的英语培训班和夜校。据统计，从1872年到1875年的3年间，在《申报》上做招生广告的就15所夜校培训班。除英国圣公会创办的英华学堂外，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在上海开设的各类英语培训班、夜校有35所。这些培训学校或夜校形式不一，但都开设写信、翻译、算法、地理等贸易中使用的英语，用英语教学，承诺能在短时间内教会英语。其中一则广告承诺，学习三个月的英语，就能与外国人会话，“启者本馆今择11月26日专教英语，学习三个月之后，可能与西人把话，其修金格外相宜，如欲前学者，请至棋盘街祥丰店楼上便是，特此预告”。其实大多数培训班、夜校学生学习的英语词汇局限于贸易货物，如常见的货物名称、日常寒暄语等：学生的英语也只限于口头表达，难以用书面语言表达：教师通过一种以汉字模仿英语读音的方法也就是采用洋泾浜英语教学方法，达到速成的目的。洋泾浜英语教学方法是一种结合中西语言，但又非中非西，通过那些与英语读音相似的汉语死记硬背来达到临时记住英语单词和简单句子的目的。

上海人曾努力将洋泾浜英语口语文字化，用汉字里的笔画和部首充当字母，使之成为可以书写的语言。清末，有些精通英文的中国人开始编写和出版用中文注音的实用英语会话手册，由于作为河流的洋泾浜一直是英、法租界的分界河，上海人也常用“洋泾浜”一词指代租界，因此，这种手册大多被称作“洋泾浜英语手册”，上海流行的皮钦语就被称作“洋泾浜”或“洋泾浜语”。

杨少坪，名勋，常州人，原上海广方言馆学生，是中国最早一批由正规外语学校

培养出来的外语人才。他未参加过科举,也未得意于官场,但曾经协助盛宣怀办过实业。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二月初五、初七、十五及十九日《申报》连载杨少坪著的《别琴竹枝词》,是目前知道的关于上海洋泾浜的最早著录。在《别琴竹枝词》的序言里,杨少坪指出英语与汉语有别,汉语是以字组词,而英语有词无字(所谓“字即语”者),要使英语说得地道,先要单词发音正确,又要遵守语法。租界里的一些洋泾浜翻译,由于没有语音与语法知识,所说的只能是杜撰英语。这百首竹枝词就从用词与语法方面来分析其错误,以便人们学习正规的英语。与此同时,他也列举了上海洋泾浜的一些例子:如“温”(one)就是“一”;“多”(two)就是“二”;“可牢基”(clock)就是“自鸣钟”;“来司”(rice)即是“饭”;“野路”(yellow)就是黄色;“讨克”(talk)就是“谈生意”。“谷猫迎”即good morning(旧沪语“迎”读作ning);“好度由途”即how do you do(你好);“肆鬼肆”即squeeze(敲诈);“密四特”即mister(先生)。

作为中外交流媒介的上海洋泾浜英语不仅在经济、文化以及政治交往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民间交流中也扮演重要角色。不仅当时来华的英美人学会了洋泾浜英语,就连其他国家来华的商人和游客也用它来交流。来自美国的冒险家华尔即弗里德里克·汤森·沃德(Frederick Townsend Ward, 1831—1862),多次在中国的战场和官场沉浮,1862年他娶了上海金融家“泰记”杨坊之女为妻。华尔只能说几句结巴的汉语,杨坊和他的女儿都不谙英语,洋泾浜英语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桥梁。一些文学作品也运用中国洋泾浜英语以实现写作的目的。在勃姆(Bohem)的《来自贵族的军队》(Of the Nobel Army)中,女主人公,一位中国妇女使用了一些洋泾浜英语如:“You no go outside!”(You can't go outside! 你不可以出去)“You go outside, you quick die”(If you go outside, you will be killed at once. 如果你敢外出,你就会被打死)。

进入20世纪后,上海经过正规学校训练的精通英语的人才越来越多,加上大批留学生回国,洋泾浜英语在上海的主流社会淡出,但在普通百姓之中,甚至一直到今天,上海人方言中还留有上海洋泾浜英语的影响,不少洋泾浜语又蜕变为上海的日常用语,如“老虎窗”(roof window)、“拿摩温”(Number one)、“枪势”(chance)、“瘪三”(beg say)、“阿飞”(fly)、水门汀(cement)等。中国洋泾浜英语最初产生于西洋的物质与文化处在“强势”,而中国的物质与文化处于“弱势”之际。在上海租界这个中西交流最为频繁的开放地区,风行一时的洋泾浜英语充分体现了人们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可以说租界不仅改变了上海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格局,同时也使中西语言与文化交流、传播成为可能。

四、洋泾浜语现象之透视

任何形式的中外交往都必须以语言文字沟通为前提，在早期的中外贸易中产生的洋泾浜语，是中西方两个历史上彼此间缺乏直接接触的集团，因为生活与贸易中交流的需求，而产生的一种以纯交际为目的，混杂了中西语言的变种语言，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成为外来者与当地民众进行交流的主要语言。它由16世纪中期出现的澳门葡语，发展到18世纪盛行的广东英语到19世纪中下叶流行的上海洋泾浜语，历经了三个多世纪。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变化，洋泾浜语到今天几乎已经彻底消亡，而且作为特定的环境下产生的洋泾浜语即便在当时也不太受大众的认同，甚至被认为是一种粗俗的语言，很少被纳入正规中国英语教育体系。

但是，在那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洋泾浜英语在早期中西贸易交流和中西文化交流中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19世纪美国在华的外交官何天爵在其著作《真正的中国佬》中提到：“外国人与当地中国佬之间所进行的巨额贸易有十分之九都是通过这一古里古怪的洋泾浜英语去完成，离了它，您还真是玩不转。”在同文馆设立之前，中外交流在较大程度上依靠懂洋泾浜英语的通事。这些通事受教育有限，对中西文化认识较为肤浅，社会地位低下，只能从事比较简单的翻译工作，不可能处理复杂的外交事务。历史上对这些通事的评价往往是贬多于褒，但是通事使早期的中外交流成为可能。民间的一些通事高手有谢清高、罗森等人，的确对中外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尤其在上海洋泾浜语时期，随着通商口岸以及租借工商业的发展，社会上逐渐出现了对洋泾浜英语的需求，一度开始兴办洋泾浜英语培训班。这些培训班重视英语的实用功能，重视简单听说能力的培训，在一定程度上地满足了商贸与民间交流的需要。可以说这些培训班为早期民间英语培训的雏形，进而对我国民间非正式的英语传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洋泾浜英语不仅在当时起着交流的作用，还对后来的英语和汉语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融入英语的俚语、习惯用语，丰富了英语的词汇。如当代英语中习惯用语Long time no see（好久不见），明显地留有洋泾浜英语的痕迹；在现代汉语中也有许多外来的词汇，如：逻辑（logic）、咖啡（coffee）、可可（cocoa）、吐司（toast）、浪漫（romance）、打（dozen）、摩登（modern）等词都是采用英语中的音译法而来的。美国人列文森这样评价中国洋泾浜英语的作用：“西方给予中国的是改变了它的语言，而中国给予西方的是丰富了它的词汇。”